方法论和历史观的新开拓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谢 平 仄

一个时期来，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阐发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的文章，琳琅满目；从哲学上进行阐述的，寥寥无几。是否说明这方面没有多少文章可作？我以为否。故不揣冒昧，试作若干粗浅探索。

一点合乎逻辑的联想

能不能只肯定《决定》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发展，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视野之外？这样恐有悖于逻辑和历史。人们熟知，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首先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以此为指南，才相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的。同时，这后两大发现，不只意味且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推向前进。今天，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时，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岂不同样顺理成章？《决定》对此并未讳言，倒有明确指出，如说所遵循的“根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思想；等等。当然，要真正领会《决定》在方法论和历史观方面的新贡献，不能局限于这些直接有关的哲学术语。只有通观全篇，在具体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抽象，方有可能企及。

“实事求是”在运用中丰富

从方法论的意义对“实事求是”作出科学解释的，当首推毛泽东同志的如下表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决定》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使它得到进一步的丰富，自是理所当然。

第一，认识“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①，是认识“实事”的基本出发点。而只有系统调查研究其历史、现状和“发展要求”，才能完整准确地加以把握。

陈云同志说得好：“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需要先了解国情。“实事”、“国情”可谓包罗万象，不可能面面俱到。注意全面性固然必

要，更重要的是认清基本出发点，因为它对全局具有基础的意义。《决定》既没有停留在我中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或“一穷二白”之类的泛泛议论；又一反过去以政治思想“划线排队”、捕风捉影“阶级斗争新动向”，及由此断言“阶级斗争始终贯穿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等“左”的一套，而把基本出发点转移到“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上来。这不只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且对探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问题具有直接的决定性。

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基本出发点，是《决定》在方法论上更值得一提的贡献。其中所强调的：“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就突破了以往把了解“实事”局限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把“实事”与“求是”截然分开的作法，并在运用中令人信服地证明：那不包含“历史经验”和“发展要求”的“实际状况”，充其量不过是残缺不全、不足以求出“是”的“实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俗谚，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现状的联系。对于“历史经验”的正确汲取，有助于全面了解现实，加深对现状的感受，包含“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的真理。很明显，若不象《决定》那样认识“由于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当成“资本主义”加以排斥，致使经济体制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发展得越来越突出的沉痛教训，是不可能深切感受“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是一个值得引起严重关切的国情的。

“发展要求”尤为以往所忽视。这同曾经把它当作超现实的可能、甚至纯属主观愿望的范畴来看待有关。《决定》用事实澄清了这些迷误，认定“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要求是现实的、客观的要求。究其本质，“发展要求”是事物的内在潜力和运动的必然趋势，理应包括在“实事”之中。并证明：不了解有关事物的“发展要求”，非但不能正确评价该事物的现实状况，更难深入发现矛盾之所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相当时期，不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在我国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迫切要求，便把“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置诸脑后，而未能发现我国经济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阻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么？

第二、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考察它们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发现社会基本矛盾的可靠方法。把对基本矛盾和出发点的正确认识相结合，才能正确揭示基本矛盾的焦点。这是搞清“实事”的深化过程。

《决定》不满足于认识国情的基本出发点，而是升堂入室，摸清我国当前的基本矛盾及其主要表现所在：“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其独到之处，是摒弃了以往那种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机械分开进行考察的方法。从理论上讲，传统方法容易割断两对矛盾之间的固有联系；在实践上，往往不是由此认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不完全真实，乃至纯属虚构，如十年动乱中宣扬的，所谓“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还顽强地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等，即属此类；就是纵然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有所认识，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门径。为何过去长期未能发现我国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病？不能说同这种孤立考察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无关。

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连在一起，分析它们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其合理性在于全面体现了基本矛盾所含两个矛盾之间的唯物又辩证的关系，不但包括众所周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能决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作用，和前一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后一矛盾的解决；还包括以往很少为人论及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及这种联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使人们的眼界为之一开。发现以

经济和政治联系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联系，可能是基本正常的，例如当政治上层建筑能正确发挥其经济职能，较好地服务于经济时，这种联系就基本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是不正常或反常的，如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过多，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分，或者政治不是为经济和基层服务，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时，这种联系则会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抵触。如此考察社会基本矛盾，不仅有一个统一的客观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破除了所谓上层建筑不能同生产力发生直接联系的旧观念，并丰富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

认识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是一个具有战略决策价值的课题。经验表明：对国情基本出发点的不同认识，可以推导出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的不同结论。从阶级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观点出发，必然得出社会基本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集中表现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的论断；若从社会主义处于充分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的观点出发，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就会如《决定》那样，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微观领域的政府机构与作为直接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二是宏观领域的国家计划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从而找到了“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成败的关键”。这些认识对于制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蓝图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求是”有根据，但无固定模式，是“有的放矢”的过程。

搞清“实事”不能完全脱离“求是”，但仅有“实事”决不等于求到了“是”。从同一“实事”出发得出迥然不同结论的先例屡见不鲜，表明从“实事”到达“求是”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要走，包括一系列的方法论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决定》在这方面的最大特色之一，莫过于“求是”有据，又无僵化模式。这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人们能在全社会规模上自觉利用社会规律，原是社会主义制度独具的一大优越性；然而唯其能自觉，也就同时潜伏着主观滥用这一优越性的危险。如把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预言，当成天经地义的信条，死记硬套在现实之中；或把先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不加分析地看作普遍公式，照抄照搬于中国；或把自己一厢情愿的向往，视为创见轻率地予以推行；……。凡此种种，其实都称不上求是。因为既有先入为主的模式，即令以某些“实事”作陪衬，也不过充当“模式”的奴婢罢了。又何需去求？求有何益？《决定》从所有这些禁锢中解脱出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事”作为“求是”的出发点和根据，贯彻无“实事”便无“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充分而恰当地运用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使“求是”真正成为“有的放矢”的过程。

首先，从“实事”国情中明确求是的“的”，是解决我国当前的基本矛盾及其在经济体制上的主要表现，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把这个“的”，既作为从对立中发现内在联系的中介，又将它作为检验所求结果为“是”或非的试金石。同时，找准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矢”，除马克思主义中最一般的立场观点外，还包括在所探讨的领域内确具普遍性又被实践检验为真理，因而具有更为直接指导意义的思想武器。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避免了以往常犯的教条主义一类毛病。例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并不贫乏，《决定》却从浩瀚的海洋中唯独摘取下述思想作为指南：“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看似不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流，对乌托邦设计的那样具体而微、美妙动人。然只此一条，即足以反映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胜的根本，保证人们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大道开拓前进。此外，《决定》很讲究“放矢”之道，尤善从对立中发现内在统一。不是概念的主观运用，而是将其体现于以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矢”，去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的”的全过程。《决定》把历来被认为互不相容的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统一起来，破天荒第一次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堪称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一) 从存在根据有所区别中，发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有共存和为实现同一目标所必要的可能。诚然，从社会主义制度看，实行计划经济是必然，发展商品经济则未必如此；从社会生产进化过程看，商品经济乃必经阶段，计划经济虽能成为一种必要手段，却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但是在一个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既有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又迫切需要发展商品经济，二者则完全可以同时存在，并对实现以生产社会化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都是“必要条件”。

(二) 从二者各有长短之中，看到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互补关系。计划经济有保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比较适当，使之大体按比例协调发展等长处，但有一个他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即不可能无所不包。若要免为其难，只会陷于空想蛮干。商品经济虽然有如一条难以驾驭的牛，却有一项是计划经济所不能做到的，它能“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对于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把经济真正搞活，实为一大长处。同时，计划经济的优越处又能起到拴住“牛鼻子”，使商品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行进的牵引作用。正如《决定》所说：“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

(三) 从两种经济调节机制的作用方式、特性等差异中，发现它们的内在要求和功能有一致之处。计划调节或通过指令性计划及指导性计划，或辅之以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指导、调节和管理，具有一定程度的自觉性和可控性；其目标可以归结为节约社会劳动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商品经济通行的市场调节方式，或通过商品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运动，或通过全社会产品总体供求之间的矛盾运动，不免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但其内在要求，则同样为一方面达到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另一方面达到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不难理解，上述两方面的功能，都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

唯物史观在坚持中发展

由于《决定》全面地把唯物史观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相结合，得出许多新认识、新构想、新政策，因而在唯物史观原理上，必然涉及不少新课题、新观点、新成果。下面只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不仅有两种不同性质，还可能有多种类型。

过去谈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一般只指出它同旧社会(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明确这一点当然十分必要，因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决定》在坚持这一原理的同时，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和完备的规定和措施，这比之过去更为明确、坚定，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矛盾类型问题。这从《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所作的具体概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可以看出这里抽象出了一种以往未曾涉及的新型矛盾。它既不同于发生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主体部分(即根本制度)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又区别于发生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个别或少数环节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

后一类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已有所论述。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某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上层建筑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等等，其所揭示的问题相对于全面性的体制而言，大都带有局部性。如果说，那源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主体部分同生产力的矛盾，可以称作“根本制度型”，那出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个别少数环节同生产力的矛盾，可以名为“局部环节型”的话；那么，发生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同生产力的矛盾，由于已深入到基本体制，将它划归“基本体制型”可能比较贴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历史已经还将继续证明：对待不同类型的矛盾同样需要采用与之相应的不同方式方法。只有变革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才能解决“根本制度型”的矛盾；处理经常出现的“局部环节型”矛盾，则需要及时而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而解决“基本体制型”矛盾，因不全面涉及根本制度，故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但它的触及面和影响度，比“局部环节型”远为深广，所以需要缜密而系统的决策规划，相对集中而长期的改革，才能逐步见效。

《决定》还启示我们要重视不同类型矛盾之间的联系。首先是“根本制度型”矛盾对其他两型矛盾的制约性。当根本制度不存在重大问题时，便给解决局部环节和基本体制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象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就是这样。而后两型矛盾的解决又必然有助于完善和发展根本制度。反之，当根本制度出现矛盾，则不但不利于处理局部环节的矛盾，尤其难以解决好基本体制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化时，便会遇到这种情形。另一方面，局部环节或基本体制的矛盾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同样会危及根本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其次，局部环节矛盾得不到解决的直接影响所及，是基本体制矛盾的形成和恶化。《决定》所回顾的我国经济体制的经历：由建国之初和“一·五”计划期间的基本合理，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某些环节的弊病逐渐暴露，直至1957年后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就是一个佐证。反之亦然。

第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既有可逾越的阶段，又有不可逾越的阶段。

《决定》关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的论断，不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解，茅塞为之顿开，还启迪人们思索一个关系历史观的重要命题：在社会历史巨流中，什么是可超越的阶段，什么是不可超越的阶段？而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尽管无不声称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都不见有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直接社会化经济）这一普遍的规律性。

人们不难读到的，倒是诸如人类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这当然无可厚非。有的教材还补充说明：在一定历史条件的局部范围内，存在越过上述一个或几个阶段，实现“社会形态跨越式发展”的可能。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人们由此产生的总观念，为何要么认为只有上述两种社会形态的变革顺序才是不可移易的？要么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可以产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甚至前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地区，又有什么其他历史阶段不可跨越？

我认为问题的出现，不在于着重阐述了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表现，而在于没有象马克思那样去进一步揭示，任何社会形态都“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②其所以如此，又主要由于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拘泥于斯大林的“三

方面”，只看重生产资料的归属，不见或轻视那更为直接体现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即组合生产要素的社会形式）；同时不联系直接关系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孤零零地看待生产力。这样，也就不可能真正“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③历史表明：人类最初只能从事仅有自然分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的发展，突破自然经济以后，只能进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又必然在发展和演变中，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才能进入产品经济。这个序列之所以不可超越，因为它们所体现的是“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这一社会生产进化过程，有如人类的生理发育过程必经幼年—少年—青年等几个不可跨越的时期一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逐渐明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无疑认识的一大进步。但由于受旧观念的影响甚深，人们仍然很少去进一步思索：我国目前究竟处于“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哪个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直接社会形式又是什么？如今《决定》指明，我国仍处于“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一“不可逾越的阶段”，无异于找到了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佳方式。这在认识上是具有更新意义的一次飞跃。

第三、社会历史是日益成为人类史和世界史的统一过程。

《决定》在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更趋完善的同时，作了必要的理论论证。但若只看表面，仍可能认为这里只提出有关中国与外国、对外开放与现代化等一类较为具体的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则不难发现由此涉及的问题要广阔深刻得多。《决定》已有所反映。如第一部分，提醒人们“应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二部分提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还要“正确对待”其他方面的“外国经验”；特别是第八部分，在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打破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使各国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思想后，强调指出：在当代，“尽管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性的经济技术联系仍然很密切，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可以说这里实际上提出了马恩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即有所论述，但往后未能得到全面发挥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命题：历史“日益成为人类的历史”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④并可看出《决定》的倾向，是在肯定二者相统一的原则上去理解它们的关系的。

所谓历史日益成为“人类史”，是指人类在本性上愈来愈远离其他动物界，被提升为具有日益发达而高尚的文明和越来越复杂而频繁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动物”的历史，以至“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⑤即逐步迈入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无穷过程。换言之，也就是社会有机体由简单低级系统，发展为复杂高级系统的历史。不难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历史日益成为人类史这一总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谓历史愈来愈成为“世界史”，是指人类生存空间的横向联系，有一种日益扩展而紧密的发展趋势。即存在一个由封闭分散系统，向开放整体系统转变的过程。人类的祖先群居处于原始时代上百万年，直到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才在西亚、北非个别地区形成若干孤立的文明点；奴隶制得到相当发展后，在亚、非、欧大陆出现地域较为广大的亚述、波斯、亚历山大、罗马、帕提亚、孔雀—贵霜和中国的汉代等帝国，人类才逐渐走向地区之间的联系；封建制的发展，一方面使区域的联系范围扩大，另一方面又形成各具特色的东亚、伊斯兰和

欧洲三大封建区域的鼎立局面；直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⑥所以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⑦我们这个长期停滞于自然经济占统治的封建国度，当世界进入资本帝国主义时，也被迫卷进世界历史的漩涡。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来，其间尽管几经外人封锁和本身闭关自守的波折，使现代化建设遭受不应有的损害，也未能完全割断与世界的联系，并逐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对外开放，我国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越来越成为全世界历史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成员。遗憾的是，对于历史的这种普遍规律性，不用说在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使在专门描绘世界历史的教材中，也曾受到令人费解的冷遇。至于“人类史”和“世界史”的关系问题，更是无人问津。人们长期对实行开放、加强国际交往疑虑重重，从认识原因分析，不能说同上述极不正常的现象无关。

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论述了“人类史”和“世界史”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统一的深刻根源，都是“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发展起来的。^⑧其间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全统一到逐渐趋向完全统一从而使人类社会加速发展的过程。马恩指出，“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⑨但是，“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保障”。^⑩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是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相伴随的，作为“人类史”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显然只能同更为发展的世界历史联结在一起。所以马恩预言：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⑪试想：没有世界历史的存在发展，哪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哪有今天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尤其处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愈来愈同它们的国际化、世界化同步加速推进的当代，不发展国际交往、交流与协作，怎么可能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

总之，只有懂得“人类史”和“世界史”统一的发展规律，才能自觉接受、坚决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才能科学预测国际交往的未来，是愈来愈向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开放；也才能正确对待国际交往的发展，是为了在全世界推进和平、正义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愈益成为人类史和世界史，是全面确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时代精神的一块理论基石。有了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的建成，是指日可待的。

注释：

①② 《资本论》第3卷，第993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④⑧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第1卷，第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